



「天子之寶」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

展品系列選介(二) — 銅器

／器物處

商代前期 弦紋鬲

高：二·八；口徑：一五×一五·八公分

鬲為款足（空足）的烹煮炊器，用途與鼎相似，舊稱「鼎款足者謂之鬲」，指出「空足」與「實足」是鬲、鼎的主要差別，但鼎也有足不實者，故應改謂：可以明顯區分腹身與足兩部分者曰「鼎」，腹足不易區分者曰「鬲」。

商代早期在青銅器移植陶器形制的過程中，已能以青銅鑄造不同的器制，包括酒器、食器、水器等，青銅鬲在當時已成為食器中極普遍的器類，「弦紋鬲」即為此種發展趨勢的代表作。此器形制及鑄造技術，皆呈現商代早期到商代晚期早階段的特點。其形制為雙立耳、深圓袋形分檔三腹、下有三尖錐狀足，與商代晚期所流行的柱狀足不同。這種器足形制

的不同，牽涉到鑄造方法的差異。「弦紋鬲」的三尖錐足為空足，內有未掏光的芯土，是因為鑄造時，使用了器腹與器足相連的內模。這種較原始的方法，雖使得全器的器腹到器足，可以器壁厚薄均一，避免熔銅冷凝後，器足與器腹因器壁厚度差距過大而龜裂。但由於器足與器腹接合部位，熔銅並未流過，盛物時，食物將流入器足，或與芯土觸及，成為此期間鬲制的主要特點。

斂口，平沿折唇外翻，上有對稱之兩立耳，立耳側視下寬上窄。束頸，腹部隨三錐足高分檔而外鼓，頸間飾三道弦紋，三鼓腹飾二道「 \gg 」形紋，從分檔處視之則成兩道人字紋。深袋足，尖錐形足跟，三錐足內空，存有範土。三足與兩耳位置俯視呈四點式，是早商鬲鼎常見的形制。



一九五四年河南鄭州楊莊出土之「X紋鬲」型制與此鬲極近，亦屬二里岡上層期，即商早期器，可以參比。此鬲鑄製精美，曲線柔婉中有峻利。耳式、紋樣、分檔與錐足，均呈顯出早商銅鬲的特質，是同期器中的精品。

（游國慶）





商代晚期 西父丁方鼎

高：二四；口徑：一四×一八·二公分

折口、平沿、方唇，兩立耳上寬下窄，俯視器口呈長方形，器腹主要由一道夔龍紋與寬幅獸面紋組成，細密的雲雷紋飾地、主紋高浮雕上更加卷雲與線紋。四角及四壁中間各有一高聳的扉棱，四柱足上飾簡化蟬紋。器內壁有銘文三字，右為族徽，或釋為「西」，左為「父丁」二字，行款與「父癸鼎」同。

方鼎最早見於二里岡上層期（如：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方鼎、鄭州張寨南街杜嶺一號鼎），鼎腹呈深槽形，商中晚期以後始作長方淺槽形，鼎腹中央及四角，也出現扉棱。

本器與另一件原藏頤和園、現藏北京故宮的「小臣缶方鼎」（高二九·六公分，口長二二·五公分），同為清宮舊物。該鼎內壁有銘文四行二十二字，記載商王對小臣缶賞賜事，「小臣缶」之名又見於殷墟卜辭，是少數可直接與卜辭聯繫的青銅器之一。而二器的形制、紋飾均極相近，可知同為商晚期精緻的鑄銅禮器。（游國慶）

商後期 獸面紋壺

高：三九·五；口徑：一九·九×一五·七公分

全器腹部曲線呈S形，腹部下垂，下接高圈足，頸部兩側附雙貫耳。此類貫耳壺的造型可以遠溯至二里頭二期的陶貫耳壺，歷經商早、中期的發展，至商晚期臻於成熟。

器表滿佈紋飾，形成滿裝的裝飾效果，是典型的商晚期作風。近口緣處為獸面紋，肩部



裝飾夔紋，腹部則以細線的帶身獸面紋為界，上下各裝飾著獸面紋，圈足為回首夔紋，雙耳則以半浮雕的外卷角獸面為飾。紋飾雖然佈滿器表，但主紋與地紋在同一平面，只有獸眼略突起於器表。

造型相同的貫耳壺在河南安陽殷墟西北岡大墓曾經出土，伴隨出土物有陶擦子、銅盃、銅盤、銅勺等沃盥水器，因此推測這類造型的壺也作為水器使用。（許雅惠）



殷至西周早期 引作文父丁鼎

高：七五·九；口徑五四·五公分

蹄足、耳足位置為五點式，鼓腹、最大徑近于腹中部、深腹、折唇、立耳微向外張，造型渾厚雄偉，為殷末周初銅鼎之特色。口沿下有一匝花紋裝飾，六道扉棱，分作二類六組，一類為正面所見歧尾式連身獸面紋，另一類則為相應於三足上方的垂尾獸面紋，空隙填飾一條小龍紋。足上端飾不連身獸面紋及三道弦紋。

類似型制、紋飾的大鼎，最早見於一九五九年河南安陽高樓莊後岡圓形祭祀坑出土的「戊嗣子鼎」（高四八，口徑三九·五公分），腹內壁鑄銘三行三十字，記錄商晚期殷王對戊嗣子的賞賜。在西周早期，則有成王、康王時的「革鼎」（高六二，口徑四七公分）、「德鼎」（高七八，口徑五六公分）與「大孟鼎」（高一〇一·九，口徑七七·八公分）。故宮另藏兩件同型制大鼎：「乃孫作祖己鼎」（高八一·八，口徑五八·三公分，重七九·六五公斤）、「子荷貝祖丁鼎」（高八五·五，口徑五九·四公分，重九四·六五公斤）也應是殷至西周早期的鑄器。

此鼎形制雄偉、立耳與折沿方唇的線條勁利，口下略為下垂的寬大圓腹極圓柔。上腹部所飾寬帶獸面紋的主體紋立雕圓厚，而中間脊棱則方折勁直。三足曲線與足上所飾獸面紋及扉棱，也同樣呈顯著方與圓、剛與柔、勁直與婉曲的協調之美，在剛健中含婀娜、端莊裡雜流麗。

銘文三行八字，表明此器是「引」為其父親「丁」所作的禮器（「文」是美稱）。

（游國慶）





商晚期 父癸爵

通高：二〇·二；流尾間距：一七·九公分

爵的定名始於宋人，其形體主要特徵為：深筒狀的「腹」、前緣用以傾注的長「流」口、後端尖狀的「尾」、流腹間上的兩「柱」、腹側與流尾成直角的把手「鑿」、以及腹底三個尖高的「足」，其一足在鑿下。

爵是考古發掘所見最早的銅禮器，它的年代可以早到西元前十六世紀的夏代晚期；當時的器形，腹部束腰而平底，流嘴瘦長作V形，三足細如尖錐，通體輕薄，有站立不穩之慮，所以在左前側長流與口連接處，有二短小釘頭立柱作為加固，以免傾跌時流嘴折裂。由於出土早期的銅爵，底部大多附著一層黑色煙灰，證明它是一種溫酒器。

到了西元前十三世紀的商代晚期，爵體已變厚，腹變直筒而深，圓底，腹下作刀狀足，流嘴變寬成U形，二立柱向後

移作裝飾用，柱頂成笠帽或傘形，右側的把手上作獸頭，漸趨厚重而精美。本爵鑿上部作犧首形，二立柱之柱頂作旋渦紋。三刀形足，一足有傷。

銘文一行三字，在鑿內腹外壁，首字為族徽。指出此家族為祭祀其父親癸而鑄作本銅爵，為祀典中的禮器。（游國慶）



商晚期 子象觚

高：二八·八；口徑：一六·八公分

觚是一種盛酒的祭器。商代早期的觚，因器身粗大而顯得口小；到了商代晚期，工匠追求曲線之美，將器身變細，使得口寬像喇叭；同時口下分出頸、腹及圈足三段。此三段式觚為晚商流行型式，上段頸飾蕉葉雷紋，近腹處有蛇紋一道，中段腹飾四個倒立的夔龍紋，下段足弧面飾解體獸面紋，足上部有橫列蟬紋一道。

銘文一行二字，在圈足內。第一字「子」，第二字形從「毘」從「泉」，可隸定為「象」，「子象」或以為乃商王族支系家族、或疑有殷商王子身份。其所作器，除本觚外，傳世另有爵、觶、觚等多件。
銘文形象生動，意趣盎然，頗有由圖繪過渡到文字的階段性色彩。在金文的族徽中，也往往有這種鄰近圖畫的古形寫法，而族徽意涵的研究，則是古文字學界極欲突破的新興課題。（游國慶）





商後期 鑲嵌綠松石獸面紋匕
長：一一·三；寬：七·二公分

匕首為橢圓形，表面以綠松石鑲嵌出獸面，在匕首之頂端接以一蠶紋，造型相當奇特而罕見。由於考古出土物中尚未見到此類器物，因此暫且稱之為匕。

以藍綠色的綠松石作為鑲嵌材料源於新石器時代，如：山東大汶口文化、陝西齊家文化均曾出土鑲嵌石器；有時也用綠松石作成裝飾品，如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的綠松石珠與飾片。至二里頭文化則出現了鑲嵌綠松石銅牌飾的成熟作品，以綠松石細緻地鑲嵌出獸面紋。

商晚期承續二里頭文化的鑲嵌綠松石技術，但多見於兵器、車馬器等雜器，不見於鼎、簋等禮容器。商代以後，以綠松石鑲嵌的風氣衰減，直到東周才又興起一陣鑲嵌風氣，但此時鑲嵌的材質則轉移到金、銀、紅銅等金屬上了。（許雅惠）

商後期 蟠龍紋盤

高：一六·三；徑：四三公分

盤面蟠伏一龍，龍首正居盤心，微微浮起於盤面，為晚商典型的獸面；盤面邊緣則環繞以夔紋、鳥紋、魚紋；盤外壁紋飾為鏤層所掩，可能為俯首夔紋。莊重古凝的作風正代表了晚商銅器的特點。



在鑄造痕跡的遺存方面，圈足內部與器底相接處有六條加強筋，是為加強圈足與器底的接合。圈足上有三個方形足孔，正與範線位置相應。根據研究，足孔是因為在塊範鑄造的過程中，為了固定上下兩塊芯土的位置而產生，商早期的圈足器普遍有足孔，直到商晚期晚段以後才解決懸浮芯土的問題。

盤是青銅時代重要的水器，考古資料顯示，商代墓葬中以盤、盂等大型水器陪葬並不普遍，尤其此器盤面又裝飾著莊嚴的龍紋，應該是等級較高的貴族才享有的陪葬品。（許雅惠）

西周早期 祖乙尊

高：三四·五；口徑：一五·六公分

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筒狀尊，呈三段式，侈口、腹微鼓、高圈足，近地有折緣，通體四方作四道透雕扉稜。口緣外壁飾尖葉形簡化倒立夔紋，其下為卷尾夔龍紋，腹部正反面均飾巨形獸面，雙目、雙角、雙耳與嘴角獠牙均聳揚出器表，形象森然，挺立的鼻樑取代扉



稜，更賦予獸面立體的威勢。腹下作二道弦紋與高圈足相隔，其下則飾曲角獸面紋，全尊莊嚴雄奇，華美富麗。與此形制相近的尚有成王時的「何尊」，昭王的「旂尊」，及同為西周早期的「商尊」，均極精美，為一時銅尊的首選。

銘文二行六字，紀錄某人（作器者名未鑄上）為其祖父乙鑄作此寶貴的祭器。（游國慶）



此卣為西周昭穆時期流行的型制，矮體垂腹，橫截面呈橢圓形，蓋的左右兩側有直立的犄角，蓋鈕捉手作圈狀，提梁上飾蟬紋，兩端作圓雕羊頭。通體以細雷紋飾地，頸部飾以浮雕獸首為中央之相對長尾鳥紋，腹飾卷尾顧首大鳳鳥紋，形象生動、線條優美。

在蓋內和器內底有相同銘文，各一行四字：「作寶尊彝」，意為鑄作此寶貴祭祀用器。無作器者與受器者名，或以為因無指明為那位祖先所作，故可在宗廟中作廣泛祭祀之禮器；或以為此乃當時預鑄好之成器（或商品），急用時則加刻作器者名，甚至不刻名，逕供他人祭祀之用。

一九七六年陝西扶風莊白村西周窖藏出土西周穆王時的「豐卣」（高二一公分，口徑八·八×一一·二公分），其型制、紋飾與此卣風格極為相近，應為同期之作。（游國慶）

西周中期 作寶尊彝卣

高：一〇·六；

口徑：九·二×二·六公分



西周早期 蟠龍獸面紋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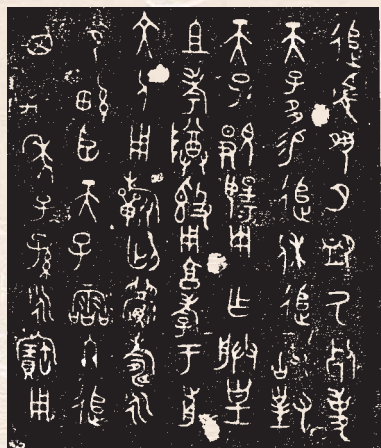
高：五七·六；口徑：一四公分

「盃」為有管狀流嘴的酒器，它是用來調和兩種酒的器皿，作為祭祀祖先之禮器。但在考古發掘中，常見盃與盤成組出土，表示盃也可代替盃，作為水器使用。此器造型奇特，氣勢雄偉，蓋鈕作立體盤龍，用雙腿撐托龍頭，龍身盤繞成三圈。器腹作四等分，鼓凸似袋狀；腹部前端有一管狀流嘴，後為一牛首鑿，腹下四柱足微外敞支立，典雅厚重，有商代晚期造型特徵。

全身除了底部，都滿佈紋飾，腹部作四幅有角的獸面，只眼珠、鼻頭及耳微凸。流嘴飾「夔龍紋」，頸部飾獸紋，足部作蟬紋，通體屬於淺浮雕，細緻精美。

在蓋內及器右側把手內的腹壁上，鑄有相同的銘文一字。此字的結構原始而象形，作斷首正面人形上有一向下足形；或可隸定作「𠄎」。當為作器者之族徽。

此盃鼓腹渾樸、蟠龍生動，滿裝紋飾精緻，早見收於乾隆敕編的《寧壽鑑古》（一七七〇年）中，知至晚在十八世紀已入藏皇宮。（游國慶）



西周晚期 追簋
高：三五·一；
口徑：二六·六公分

器腹外鼓，呈S型曲線，圈足低窄而外侈，下承方座。形制與厲王時的〈猷簋〉相近。器身花紋滿布，頸足飾西周中晚期盛行的竊曲紋，腹及方座四壁飾旋轉對稱的夔紋，近於立雕的半環夔龍形耳，極其精緻。耳與器身應為二次鑄接，故腹內接耳處有四點接榫口。

銘文七行五十九字，重文一，大意說「追」朝夕敬事於其職守，克盡其責，天子於是厚賜「追」，「追」因而鑄作此器，以頌揚天子之德，並以祭其祖先與先人，更祈長壽平安，君臣關係良好，長保祿位，子子孫孫永寶用。

傳世〈追簋〉多件，北京故宮、日本書道美術館、美國布朗達治博物館亦有藏器。（游國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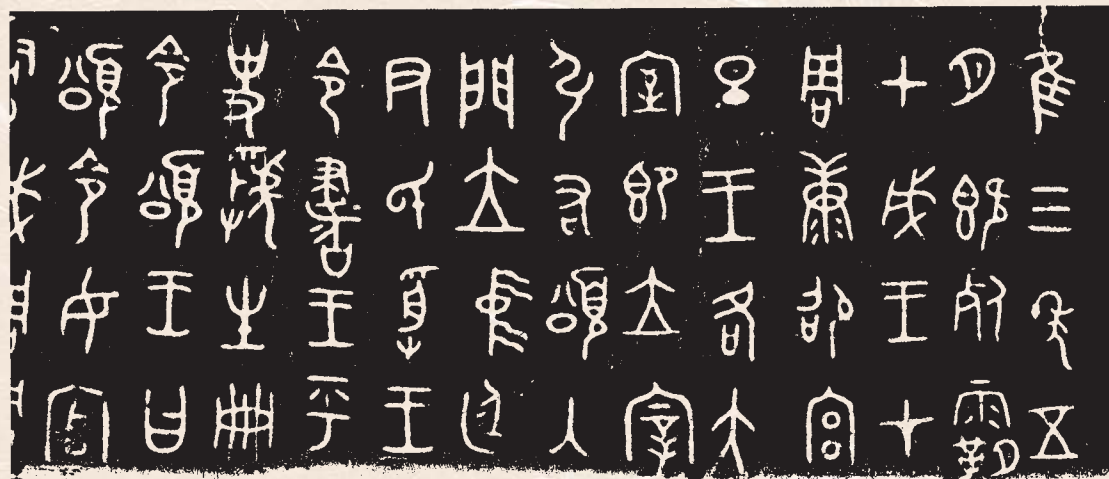
西周中期 作寶尊彝尊
高：一七·六；口徑：一七·三公分

敞口、口下飾仰葉夔紋四，頸飾顧首夔紋一道，間以二獸首。下腹外侈，飾顧首卷尾大鳳鳥紋，與「作寶尊彝卣」同為穆王時器。銘文一行四字：「作寶尊彝」，無作器者與受器者名，其性質應與「作寶尊彝卣」相同。

西周在穆王之時，銳意變革，擺脫商人舊

習，屬於周人的青銅禮制逐漸形成，器類、型制、紋飾乃至銘文，都有一番新面貌，與西周早期承襲晚商者截然不同。本器的矮體尊式、卷尾鳳紋與整飾少奔放的銘文書風，都是西周中期新興的藝術型態。

與本器風格相若之器有與「豐卣」同時出土的「豐尊」（高一六·八，口徑一六·八公分），為西周穆王時的標準器，本器所屬時代，亦當與之相近。（游國慶）



蓋銘

西周晚期 頌壺

高：六三；口徑：二二·二×一六·九公分

青銅殉埋禮制系統從商人重酒器，轉變到周人重食器的趨勢，在西周早期已漸明顯。商代發展出的多類別酒器，到西周中期以後，已漸隱退，出現獨重酒壺的現象，銅壺器型變高大，三十甚至五十公分以上的圓壺、方壺倍出，這種大型的圓或方腹的酒壺，在西周中期以後到春秋戰國，歷久不衰。

頌壺器身頸部外飾環帶紋，內壁鑄銘文二十一行一百五十二字，腹部飾交龍紋，圈足飾並列式垂鱗紋。蓋有子口，上鑄銘文四面共三十七行一百五十二字，蓋鈕亦作垂鱗紋，蓋沿飾獸目交連紋。雙耳獸首，以二次鑄造法嵌套一圓環。器身豐偉，紋飾富麗，在銅器紋飾逐漸褪去風華的西周晚期，宛如一盞暗夜明燈，放射出璀璨光芒。

其作為冊命內容的長銘，詳細記載周王對「頌」的一次冊命儀式，時、地、人物描述清晰，儀式程序完整，冊命內容與賞賜亦備載無遺，是研究西周冊命制度的重要參考資料。至於一百五十二字近於「史籀篇」的大篆法書銘文，精緻典雅，更為先秦書法史留下一頁瑰麗婉秀的極則。

傳世頌器有「頌壺」、「頌鼎」、「頌簋」等十餘件，銘文均為一百五十二字，記錄同一次冊命賞賜，不禁令人揣想「頌」於當時究竟立下何等功烈，才能如此大手筆的鑄作青銅禮器。（游國慶）



西周晚期 人足獸鑿匜

高：二四·五；口徑：一七·一×三四·二公分

古人在舉行祭祀或重要的典禮時，為表示誠敬，先要有淨手的儀式，故以「匜」盛水盥洗雙手，並以「盤」承接流下之污水，因此二者常是成組出現的。「匜」的器身大多寬廣如水瓢，一側有流以便倒水，另一側有鑿方便持握。



器身口沿下飾以變形獸紋組成之鉤曲紋，腹飾瓦紋，均為西周晚期常見的紋飾。四足作立人形，立人交臂，以頭頂接於器腹側底，觀其裝扮，似為異族為僕役者。鑿作巨獸俯首入匜內飲水狀，形象生動自然。敞流口曲線優美，極為精雅。是西周晚期頗具巧思與意象的青銅水器。
(游國慶)

春秋 子蘇鐘

高：三三·二；寬：二二·一；深九·八公分

索紋橋鈕，舞部飾雲雷紋，圓凹形枚，篆部及鼓部飾蟠虺紋。鉦兩側及中間鑄有銘文三十六字。鐘體內腔於鼓部及兩銑都有鑄磨痕，顯示這件鈕鐘曾是實用編鐘中的一件。銘文釋讀如下：「邾大(太)宰欒子口，自乍其口鐘口堵，吉金虞呂口用口眉壽多福，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邾國為顓頊後裔，周武王所封，春秋初為魯國附庸，從傳世器邾公鈞(革)鐘自稱「陸終之孫」，可知其為楚系族屬。銘文所示「欒子口」，欒即是文獻中的叢，為邾太宰的采邑，舊釋邾太宰子蘇之名應為誤釋。「自乍其口鐘口堵」：依原器觀察判斷可能是自作鐘「二堵」，被增飾誤讀為「五金」。因此可得知這一套完整的鈕鐘，應該是十六件編鐘。
(朱林澤)



附件：鈕鐘木座附玉劍飾

高：三三·五；寬：二六·二；深：一九·七公分

整體作牌坊形鐘亭樣式，頂上橫額有乾隆御題銘文作：「姬代範金模，名猶傳子蘇，勒銘永保享，出土久模糊，奚用稱珍也，由來視

此夫，設因從譯義，說訓語殷吾。乾隆辛卯新春月上澣御題(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鐘架連結鈕鐘處以仿古玉瓊(衛)為飾，鏡架四周有劉統勳、觀保、王杰、彭元瑞、劉綸、錢維城、于敏中、王際華等八臣題詠。
(朱林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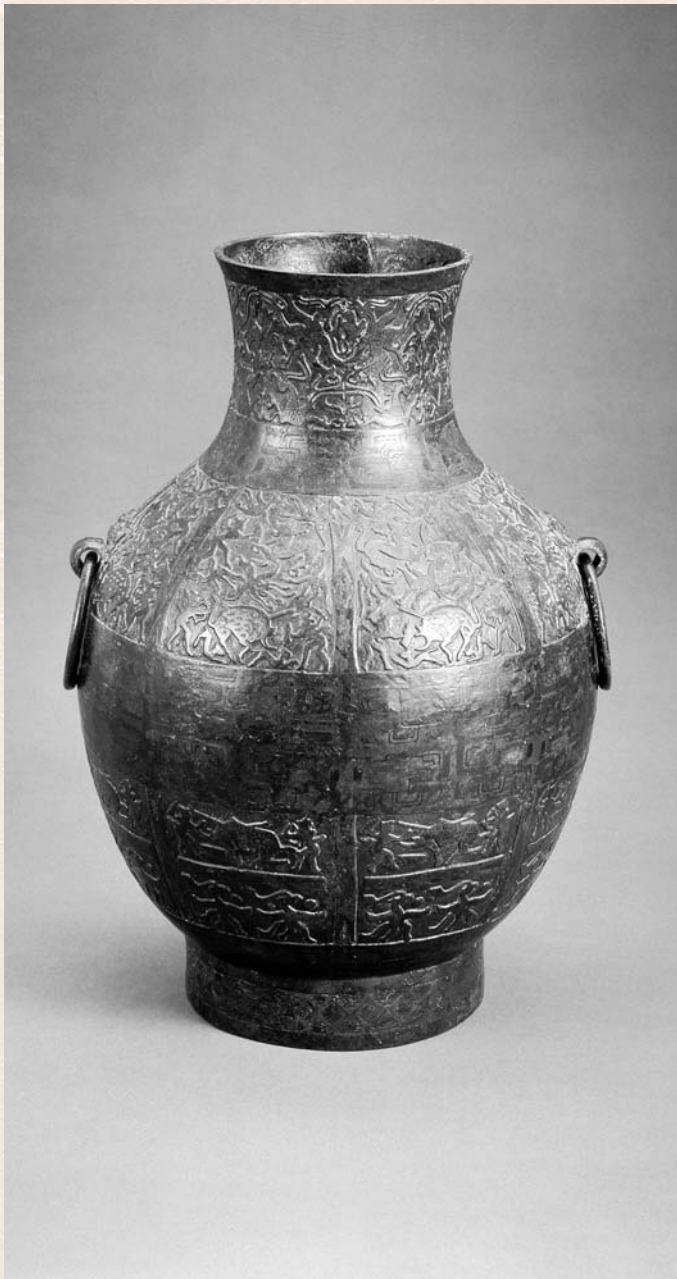


戰國中、晚期 嵌綠石孔雀 金屬絲犧尊
高：二八·六；徑：四〇·六公分

整體作動物造型，全器以金屬絲鑲嵌勾連雲雷紋，以綠松石鑲嵌眉毛，頸部為貝紋項圈，背部開孔以納酒，口部有流以傾酒。

犧尊所象為何？雖然無法明白確指，但犧尊身軀實體感的掌握與面部的描繪，在上古銅器藝術中都算得上是難得的寫實作風。形態相近的犧尊在河北平山、山東臨淄、江蘇漣水三里墩曾經出土。

商周動物造型容器歷有出土，然各地取材不同，風格也有差異。這類動物造型容器可能即《周禮·司尊彝》所記載的犧尊一類器物，反映出禮制的需求。宋代以後，由於孺慕三代，製作了不少仿古犧尊，其基本造型即來源於此。（許雅惠）



戰國早期 狩獵紋壺
高：三六·六；徑：二七公分

全器裝飾以浮雕之圖像紋，頸部為鳥銜蛇，肩部帶翅膀的神人，腹部則飾以塊狀的人獸相搏，下腹間以勾聯雲雷紋。壺形則為戰國早期以來流行之鼓腹壺，造型簡單，僅在肩部兩側貼附獸首銜環。

以圖畫性內容作為裝飾是春秋晚期銅器的一大發展。中國商周銅器多半以獸面、鳥紋等圖樣為飾，至春秋晚期（西元前五世紀初），

先是在中國北方的銅器上出現狩獵紋，隨之中原地區銅器也出現燕樂、戰爭等帶有情節的圖畫裝飾，形成中國青銅器十分突出的裝飾風格。

由於這類圖像紋以狩獵紋出現最早，且出土於中國北方，因此推測圖畫式的裝飾意念可能與游牧民族有關，尤與岩畫風格有相近之處。然而，這類圖像紋銅器的分布有其地域性，考古資料顯示河南、山西、河北、陝西等地較為流行，南方的楚地與東方的齊魯相當罕見。（許雅惠）



戰國 奇字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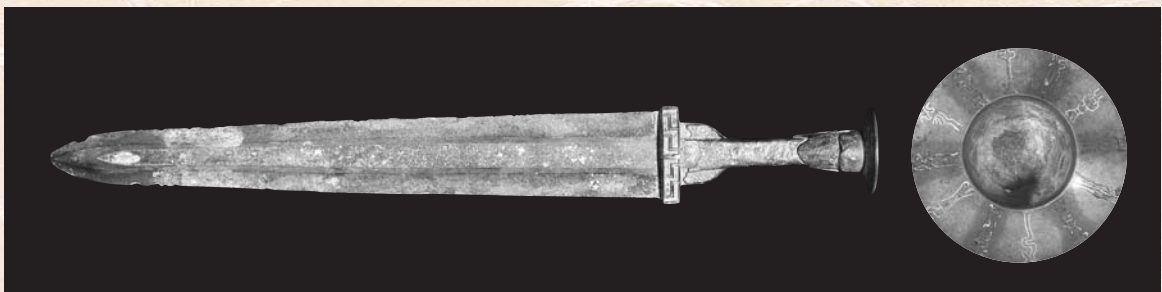
全長：四〇・七；劍首寬：四・三公分

銘文十二字，在劍柄尾端，鑄銘嵌金銀絲，為南方盛行的變體篆書，新莽六書所謂「古文奇字」，實亦鳥蟲篆書的一種，即美術化的戰國古文形式。本件銘文辨識不易，或隸定作：「唯張公之居旨邵亥留兀（其）邵僉（劍）」。劍格飾曲折線紋，無銘文。

三十年代安徽壽縣出土「越王剛旨不光劍」，劍格正面與背面有銘「越王剛旨不光自作用劍」，另於劍首有銘十二字，與本劍「奇字」全同，故知本劍亦當為「越王剛旨不光劍」。「不光」當即越王朱句（州句）之子「不揚（翳）」。

春秋戰國時期，當中原一帶主要仍靠戰車作戰時，南方楚地及吳越地區則是水鄉澤國，地多林莽，吳越地區的主力軍多為步兵，適合近戰的短兵——劍，遂在吳越地區得以長足發展，成為「刀劍之鄉」，「干將」、「莫邪」等名劍故事傳說，即生發於此。而其美術文字——鳥蟲篆，亦與之並興。「奇字劍」正可為此特殊的鑄造工藝及裝飾文字作最佳的見證。

（游國慶）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 嵌金銀雲紋樽

高：一〇・二；徑：八・七公分

筒形器身下接以三蹄足。器身以金銀片鑲嵌大面積的勾連雲雷紋，從該件器物表面的雲雷紋似仍帶有圓形螭眼可知，戰國至西漢流行的勾連雲雷紋實為蟠螭紋抽象變形的結果，類似的變形蟠螭紋在戰國晚期楚墓漆器上也相當流行。

此類器物以往與盛裝化妝品的「奩」往往不易區別，但山西右玉出土了自名「溫酒樽」的例證，可知此類筒形器應正名為「樽」，是一種盛酒或溫酒的容器。這類酒樽在使用時，下方常置有承盤，兩者搭配使用。

「樽」出現於戰國晚期，大盛於漢代；原來以木為之，如湖南長沙戰國晚期便出土了大量漆木樽，後來身分高者以銅為之。如本件般在表面鑲嵌以華麗金銀者，應是貴族在日常生活中奢侈品的反映，反映了上層階級的富貴享樂。

（許雅惠）



西漢中晚期 銅雁爐

長：一九・八；寬：一九・八；高：一五・五公分

全器分為雁爐與承盤，爐體全形作昂首挺立的雁鴨形，額頂飾覆羽，長頸穹背，雁背鏤空為蓋，飾透雕卷雲紋，雁足直立錁於淺盤形底座上。

承盤折沿淺腹、微弧底、低圈足殘傷殆盡，盤中心一孔為原器遺跡。推測可能是漢博山爐的承盤。後世將兩件漢器拼裝成組。

爐身內壁可清楚的看到范線，外觀則只剩修整的銼磨痕，卷雲紋蓋墊片清晰明顯為范鑄而成，雙足分兩段，上半段與爐身是一體鑄造並預留鑄錁結構、下半段足蹠則將預先鑄成的承盤與爐身鑄錁成完整之器。

一九八二年山西朔縣出土一西漢晚期鴨形薰爐，爐體與本件相同，差別在於院藏雁爐整體造型較接近西漢中晚期山東諸城楊家庄子所出之器。因此可推斷院藏薰爐與諸城、朔縣所出之器製作時代相近。

（朱林澤）



西漢中期 見日之光鏡

徑：二三・六；厚：〇・二五公分

圓鈕四葉紋座，鈕外兩個凹面雙線方格，四枚乳丁紋裝飾於大方格四角，方格內鑄銘八字：「見日之光，美人在旁。」其外四方中心處各飾二疊草葉紋，四角飾單層草葉紋，以四乳丁為中心，左右向內勾卷飾卷曲葉片紋，鏡緣飾十六內向連弧紋。本鏡不論銘文、紋飾布局在草葉紋鏡中皆屬稀珍之品。

草葉紋鏡依紋飾特點可分出三個亞形，於鈕式亦有多種變化，而銘文種類有二十餘種其中以「見日之光天下大明」最為常見。一九六八年出土的中山靖王劉勝墓，出一華美的草葉紋鏡其絕對年代為漢武帝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三三）年，從考古資料看來草葉紋鏡流行於西漢前期至中期，而武帝時期（西元前一四〇～八七）是最集中的一段。（朱林澤）





漢 王登私印(母印)

高：一·七八；印面：一·六五×一·六·九公分
爲子母套印之母印，虎鈕。白文四字，隱約作「田」字格式排列，無邊欄。

漢人篆書入印者，號爲「繆篆」或「摹印」，是調整頗長小篆爲方整篆體的一種新篆形，用於印章，方便排列布局，其巧妙者，則能在平正中寓圓轉、規整中見流動。

此印以圓筆見長，線質豐厚，轉折提頓自然，是漢印藝術中的精品。

漢 王長賓印(子印)

高：一；印面：一·四五×一·四五公分

此爲子母套印中的子印，鈕似覆瓦，正可納入母印虎腹之內。

印面鑄白文四字「王長賓印」。「長賓」當爲母印「王登」之字，「登」爲其名，此子母印即合姓名印與姓字印爲一籠，便於使用。至於印文中的「私印」、「印」字，則爲當時鑄印家配合使用者姓名字號之加添字，總以合爲四字方便布局爲多。

本印文以方筆見長，起收筆處方切取勢，顯得勁利許多，而行筆時亦方圓兼用，使全印在疏密相映中，有剛柔相濟之趣。(游國慶)

漢 「天勝」銅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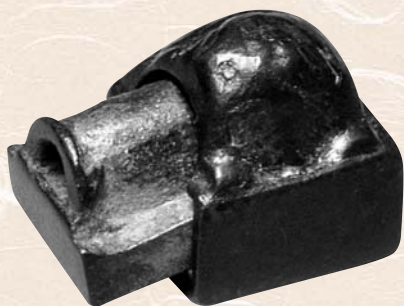
高：一·二五；印面：一·四·六×一·四·三公分

橋鈕，印面陰鑄二字白文，從印面彩照可見凹文筆道中有鳥形之首、眼、羽翅線條紋飾。想像當時鈐抑於封泥之上，捺印出的陽文筆畫上即可清楚看到鳥蟲魚形的裝飾意趣，尤其是「天」字，字首一橫，似作魚形，字下大形，則作一昂首展翅上沖的飛鳥狀，形象生動。

兩漢以前，璽印皆用於封泥，封泥之用，即封緘文件保密時，先用細繩打結繫牢，再於打結處粘上一小塊黏土，然後將銅印按壓在泥塊上，使它出現印文，便將文件封妥。泥封乾後，欲拆結讀信，必會損傷封泥，因而有防奸僞的作用；而璽印抑泥產生的印文(官名或人名)，則有徵信取證的用途。大約六朝以後，才有濡朱的印色，將印章抑蓋在絹帛或紙上，由此印內凹紋飾的設計看，確爲泥封之用，若爲鈐朱，則無法表現其精緻的巧思。



(游國慶)



十六輔國將軍章

高：二·〇七；印面：二·三三×二·三三公分

「輔國將軍」之官名，始見於東漢末獻帝建安元年，三國暨魏晉南北朝諸國亦多設有「輔國將軍」。《通典·職官》載魏晉的輔國將軍均三品，與征、鎮、安、平將軍及龍驤、征虜將軍同列。《隋書·百官志》載梁曾三度改定將軍名號，其中均無「輔國」之名，可知「輔國將軍」一官，在南朝齊梁之際，恐已消失。

傳世輔國將軍章僅見二方，一存北京故宮，印文蝕泐較多，印鈕龜首已斷失。另一則爲此印，質地爲鑿金銅印，龜鈕。龜鈕身小形簡，頭頸細長、印身厚高。印面作白文五字，筆畫尖削，雖爲刀鑿，而線條挺拔，方中帶圓，章法自然。二印印制相近，印風相類，疑同爲十六國遺物。(游國慶)





六朝 鳳首鐺斗

高：二九·五；口徑：三〇×三二·八公分

器身呈斗形，口部外敞，平底下接外撇三蹄足，蹄足之關節、蹄爪形象清晰。口緣一側有流，器身置一S形把，把首為鳳首形。鳳首把與流恰呈九十度相對，便於傾注液體。器底的三細足與婉轉的鳳首把塑造出全器輕盈的效果。

鐺斗造型來自於戰國的「鐺」，兩者都是漢代常見的溫酒器，通行時間可延續到南北朝。關於鐺斗的用途，由於江蘇鹽城西漢墓《考古》一九六四：八）之鐺斗出土時置於火盆中；另外，還有鐺斗自銘為「溫酒鐺」，均可證鐺斗為溫酒之器。（許雅惠）



東漢—六朝 異獸燈

長：一三·三；寬：六·五；高：七·八公分

全器作異獸形，頭頂有雙角，身側有雙翼，口銜一耳杯，器腹中空，動物的背部有一孔，孔內插一管柱，依虹吸原理可自腹腔汲水。

自宋代以來將這類器物歸為文具中的硯滴，除了有銅錫合金製成的外，也有以盜製成的，清代則美玉、水晶等美石都可做為材料。然而，這類器物究竟何時出現，它們真的是文具中的硯滴嗎？其實它們原本是燈具，根據目前的考古出土資料看來，大約出現在東漢，一直沿用到六朝，在南北朝時可能已開始被當時人改做為文具硯滴。（嵇若昕）



唐初 素月鏡

徑：一三·七；邊厚：〇·七公分

圓紐圓座，內區五瑞獸左旋環紐，或立、或馳、仰首、回顧、形態各異，穿梭於葡萄蔓枝紋中，外起高稜脊飾三角紋與銘文區相隔。外區鑄銘二十四字右旋而行：「光流素月，質稟玄精，澄空鑿水，照迴疑清，終古永固，瑩此心靈。」鏡緣斜高起稜，飾三角紋。

此類瑞獸銘帶鏡的紋飾，除了瑞獸數目不同外，獸與獸間的補飾花紋也有如：變形鳥獸紋、流雲紋、花葉紋、葡萄蔓枝紋等不同變化。而本鏡紋飾在銘帶鏡中可歸

類於較晚的形式，與唐高

宗麟德二年墓（六八五）

所出瑞獸葡萄紋鏡

內區紋飾相近，因

此本鏡製作時代

約在唐高宗時

期（六五〇）

（六八四）。也

由於這一類瑞

獸葡萄蔓枝紋

的出現，進而

開啓了盛唐華

麗高浮雕式瑞獸

葡萄紋鏡的發展

契機。（朱林澤）



附件：西清續鑑 乙編 第二十九冊

（鏡匣）

長：四四·五；寬：三一·厚：五·二公分

本件鏡匣所收兩面古鏡，一為隋末唐初之玉匣鏡，一是唐初素月鏡。鏡匣整體外觀裝璜成五公分厚的「冊葉」形式。外觀為淡茶葉末色綾飾米白色雙龍戲珠紋，封裡忠實描繪所藏銅鏡紋樣，封底是董誥所畫垂絲海棠。銅鏡則依形挖槽藏於主體「厚冊」之中，以軟墊為隔、再實之以璧形紫檀木托作蓋，木托正面刻吉祥圖案、背面則有趙秉沖書詩文與關槐畫的山水。

院藏鏡匣分為《寧壽續鑑》（乾隆六十二年，一七九八製作）和《西清續鑑·乙編》（王杰等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兩種，與《寧壽鑑古》、《西清古鑑》合稱清初四鑑。這是乾隆皇帝對清宮收藏的古銅器作有系統的考定整理。審視乾隆皇帝對古銅器的認知和圖錄的編撰，並未超越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圖》，但由於以帝王之好、蒐之集之，及清初自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以下清代學者致力於金石文字考証累積的成果，卻也為後世開啓一道窗、留下一個豐富的寶藏。（朱林澤）

隋末唐初 玉匣鏡

徑：一五·四；邊厚：〇·九公分

鏡鈕作八出交錯枝條狀，每一分枝向外飾以上下兩片似銀杏狀扇形葉片，八組葉尖之間飾水波紋。鏡緣鑄銘二十字：「玉匣初開鏡，輕風拂去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

從歐陽修的詩「鴨腳生江南，名實本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酬：」得知銀杏在宋代因上貢天子才廣為人知，銀杏即公孫樹俗稱白果樹而鴨腳是其異名，明代《事物異名錄》稱其果實久而後生，公種而孫方食也，故名，隱然有福壽綿長之義。

隋唐此類銘文鏡紋飾多見於：四神十二時

鏡、瑞獸鏡、團花鏡。而本鏡裝飾

銀杏水波紋是較為珍稀之品

類，「玉匣」銘前兩句

傳世品中至少有三種

以上之變化，後兩

句則較為一致。

這類讚頌銅鏡功

能的銘詞，大

都出現在隋末

唐初，稍後則

改以描述閨閣

整妝的銘文為

主。（朱林澤）



主。（朱林澤）





元世祖忽必烈於中統元年（一二六〇）命國師八思巴始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一二六九）詔命「蒙古新字」正式頒行於天下，當作「譯寫一切文字」的「國書」，也稱爲「八思巴字」。八思巴字是一種使用字母的拼音文字，其廣泛用於元代的詔書、法令文告、印章符牌、除了譯寫漢語經史之外，拼寫的語言還包括蒙古語、藏語、梵語、維吾爾語等。（朱林澤）

銅質，板狀橢鈕有孔可穿繫，印背平板右上角鑿刻漢字「上」，作爲區別印文方向之用。印面有寬細雙重邊欄鑿刻陽文四字，印文是以八思巴字對譯蒙古語。左邊兩個音節可譯寫爲「台吉」，這個語詞是源于漢語「太子」的蒙古語，此處指出身於蒙古皇室的男子，即蒙古貴族；右邊二個音節詞意可譯作「記號」，蒙古語的「記號」語詞源于突厥語，其意義相當於漢語唐宋以來官私印章常用的「記」字，在此處指「印」。因而此印可通譯爲「台吉之印」，據照那斯圖（蒙古語學者）認爲，這是迄今所見唯一的蒙古貴族之印。

元 「台吉之印」銅印

高：二·三三；印面：三·二x二·八九公分



盛唐 飛仙四岳鏡

邊長：一九·三x一九·五公分；厚：一·二公分

鏡作方菱花形，圓鈕飾番蓮花瓣紋，變形四葉雲頭紋鈕座，若將鈕座橫平置之，劃一水平線則上、下紋飾恰成對稱之態。座外隅角四禽鳥口銜花枝翔於雲氣之上，四方各飾一崇山峻嶺；禽鳥之上四飛仙巾帶飄揚雙手各持一祥花草飛升於雲氣之上，四方山岳上更飾三道橫界線似有雲山隱於其間。鏡邊寬素，近緣飾禽鳥雲氣紋一周。

由西安唐玄宗天寶四年（七四五）陝西西安韓森寨M1所出飛仙鏡得知，此類紋飾流行於盛唐。韓森寨M1所出該鏡下方山岳代表人間淨土，上方雲山象徵佛國清境，雲山三道橫線或許象徵佛教三界之義，佛教認爲三界（梵文Trilokya）是「迷界」，是有情眾生存在的三種境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皆處在「生死輪迴」中，唯有從三界解脫達到「涅槃」才能成「佛」。或許這正是所有飛仙鏡特別強調三橫線的奧義所在。（朱林澤）

元 漢梵兩體準提咒鏡

徑：九；邊厚：〇·三公分

圓鏡素窄邊無鈕，鏡中置一委方框，內區中心鑄一小篆「佛」字，方框內緣鑄漢文楷體、外鑄梵文，均飾準提咒各一圈。

準提亦作準胝，爲「清淨」之義，意思是「心性潔淨」。常持準提咒能消除一切苦厄，增進福德智慧，使眾生延年益壽，還能止小兒夜啼，過去在民間廣受崇拜，尤受婦女歡迎。

浙江寧波市元墓出土一帶柄準提咒鏡，紋飾與本鏡全同大小亦相近，唯差別在殘柄上鑄銘「澹然子造」。而本鏡無柄無鈕，可能不是實用器，應屬於宗教儀軌用的法器，相當同性質但更明確的如北京故宮所藏兩面明代準提咒雙面鏡。（朱林澤）





清 獸面紋鼎

高：一八·六：

口徑：一四·八×一四·五公分

仿商代的鬲鼎造型，在外鼓的三袋足處裝飾著浮雕獸面，柱足上飾以垂葉紋。紋飾部位以金銀鑲嵌，特別以黃金嵌出閃亮的獸眼，即所謂「黃目」。最後將表面磨錯，展現出油潤光滑的效果。

商周銅器在秦火之後，雖偶有出土，但往往被視為祥瑞奇物，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宋代，在朝廷的帶動下，興起了一股收集研究銅器及其銘文的風氣，宋人對於金石研究的成果便成為明清仿古銅器的重要參考。

本器即為典型的仿商銅器。表面雖以商代獸面為飾，但精神趣味完全不同。它在商代風格的鼎上施以東周盛行的嵌金銀技法，形成既古又奇的效果。這種金銀鑲嵌技法為明清仿古銅器（無論是仿商、還是仿周）大量採用，尤喜在眼睛嵌以黃金，即鑑賞書所稱的「黃目」。（許雅惠）